

作家访谈

《中国在梁庄》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它将人们的视野带回到一个普通的乡村,触及那个地区的生存环境,感受那个群体的心理状态,理解那些个体的悲欢离合:坚守土地的农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进城的农民工……一个个生命个体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奏响了一首悲情的歌。

“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前不久,《中国在梁庄》正式出版,该书捧得2010年“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作者梁鸿,以家乡河南邓州一个中原大地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为调查对象,采访百余人,通过一个个乡村人物的具体命运,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

“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来自“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的这些评论,或许正恰当指出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梁鸿记述了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呈现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流于“形式”。

在书中,梁鸿通过口述实录、现场调查等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人生故事,他们的情感和所面临的问题传达出了乡村内在的生存状态。

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Q&A

回归大地源自内心的渴望

海南周刊: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原本教书、发发文章即可完成工作,让你萌发写作这本书的动因是什么?

梁鸿:写作的念头已有十来年了,真正决定要做是在2005年以后。要说缘由可能有几个层面。

写《梁庄》并不是出于理论的需求,恰恰相反,是因为情感的需求。

一是出于对自己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情景:故乡、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亲人们。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阻碍”和“病症”,这使我非常痛苦。我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生活、精神和痛苦,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另外,在长期的文学研究中,我发现当代乡土文学恰恰缺失了对90年代以来的乡村现实的描述,很多作品中的乡村是一个抽象的乡村,完全结构化和虚构化。

我一直认为,回归大地是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但是否真正落实为行动却不一定。这次回乡的调查行动,实际上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考验,看自己能否真正做到从精神到行动的突破,把学术落实到现实。

海南周刊:为了这次写作,听说你做了3年理论准备?

梁鸿:是的。如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三农的,等等,我靠近书桌的书架上摆的全是这方面的书。如《忧郁的热带》、《菊与刀》、《原始部落的性格与气质》、《乡土中国》、《江村经济》和一些当代学者的乡村社会学调查,如贺雪峰、温铁军、秦晖、吴毅、于建嵘等人的书,我都看了不止一遍,也做了不少笔记。这些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增加了我对乡村的理解力。

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发觉,这些理论最多只能在方法论上给我以指导,当面对一个个乡村生命时,他们的痛苦、忧伤、欢乐无法用某一种理论思想或某一种结构模式来衡量,来解释。

在这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以极其复杂的纠结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也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不把他们看作某一个阶层,某一种符号,我要把他们作为一个个生命写出来。这一个个生命所包含的信息可能会远远超出我的理论概括。当然,也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我更擅长的是进入情感、人性深处。

处于困顿状态的故乡

海南周刊:初回老家梁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中国在梁庄》梁鸿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11月

《中国在梁庄》： 直击中国农民的 痛与悲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梁鸿

农民可以走出去,但那一定是想出去工作,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为了人生有更阔大的背景,而不是一种“必须”和“漂泊”的状态。

海南周刊:这种理想化的生活如何才能实现?

梁鸿:需要我们所有人,所有生活在中国的普通民众、官员和知识分子等共同努力,需要我们去关心、理解农民,需要我们真正走进农民的心灵,去倾听他们的情感和需求,然后再去帮助和做各种实践。

海南周刊:你把自己生长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去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上,有没有想过,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能激起如此反响?这本书的价值在哪里?

梁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只是自己想写,必须要写。如果说价值,那么,它的启发性可能大于它的价值。

如果因为此书,大家想到自己的家乡,或者真的背着包回到了家乡,并去思考我们民族的发展和整个中国乡村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它的价值。■

读书札记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梅国云在长篇小说《第39天》中,深深拷问人性中那些或惨淡或灰暗的生命底色。

军旅为梅国云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精神向度和丰富的情感资源。曾在部队工作生活二十多年的他,对部队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那么真挚炽热。

转业到地方,尽管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梅国云对部队某些方面的关注程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小说《第39天》,描写了一位由特勤中队队长岗位上转业的大学生干部被安排转业后的39天生活经历。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倾注情感书写。

主人公牛大志,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大学生干部,满怀一腔热血来到军营,但由于个性的张扬,在军营打拼了9年之后,被安排转业。这对于一个视军旅为人生全部,以报效国家为已任的青年军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就在牛大志离开特勤中队队长的岗位后,作者通过精心“安排”,“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先是牛大志为了解救人质而枪杀自己的亲叔叔,再到为了躲避枪杀叔叔的“罪责”,在火车上巧遇恐怖分子林广进,从而制止了一起“敌特”精心策划的恐怖行动。

在梅国云看来,军人无所谓战时与平时,无所谓走与留,甚至无所谓生与死,只要“报效国家”、“献身使命”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脑海,一切的“私利”和所谓的“自我”都显得微不足道。



《第三十九天》梅国云 金城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情感的波澜壮阔 与人性之痛

文/本刊特约撰稿 余正斌

小说中,牛大志虽然被安排转业,但他骨子里的军人“责任”无时不在,他报效国家的情感始终在他的思想里发挥着作用。所以,小说中出现牛大志被安排转业后,为了救人质枪杀亲叔叔和为了制止恐怖行动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部队里的80后、90后,这些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军人群体,并非是人们曾说的“垮掉的一代”。虽然他们很“张扬”很“自我”,这一个性特点也始终充盈着他们整个军旅人生,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对他人、对国家、对社会和对军人责任使命的解读与认同。

小说《第39天》,贴近现实生活、贴近武警官兵实际、贴近“特勤”中队这个特殊战斗群体的叙事语境。小说在塑造牛大志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始终把牛大志放在“特勤”官兵的生活、“特勤”中队所担负的任务和来自各方对“特勤”官兵的高标准严要求的环境中进行人物刻画的。

作者从牛大志的日常生活入手,从他很具特色的个性展开,通过环境的渲染,生活细节的描述,人物内心的刻画和故事矛盾冲突的发展,由点及面,由内至外,由小到大,使牛大志的人物形象由开始的一个很小模糊的点,逐渐形象丰满起来。

小说中,牛大志并非纯粹绝对的英雄主义者,他有过彷徨、震痛,甚至不敢面对现实,以及他身上的某些“个性”的东西,都反映出他很“人性”的一面,这样,才使他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形象逼真。

小说《第39天》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不断向人们发问。牛大志作为部队加速人才队伍建设,被引进部队的优秀大学生干部,仅仅因为“个性”张扬,有点“自我”,就被“为官者”安排转业。这是对部队用人制度的一种拷问与反诘。部队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何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为官者”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现实问题。■